

新疆政协文史资料

ZHIZAI
XINJIANG

新疆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

我们成长在 那个年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各族妇女成长口述

◎主 编/刘 云 杨 霞 张玉霞

◎副主编/唐彦临 石丽莹 杨 丽



志
在
新
疆



兰州大学出版社



新疆政协文史资料(第52辑)

志在新疆

我们成长在 那个年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
新疆各族妇女成长口述

◎主 编/刘 云 杨 霞 张玉霞

◎副主编/唐彦临 石丽莹 杨 丽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成长在那个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各族妇女
成长口述 / 刘云,杨霞,张玉霞主编.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4

ISBN 978-7-311-03656-0

I. ①我… II. ①刘… ②杨… ③张… III. ①妇女—
生平事迹—新疆—现代 IV. ①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0885 号

策划编辑 宋 婷
责任编辑 钟 静
装帧设计 刘堪海

书 名 我们成长在那个年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各族妇女成长口述
主 编 刘 云 杨 霞 张玉霞
副 主 编 唐彦临 石丽莹 杨 丽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88 千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3656-0
定 价 38.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前言

新疆政协文史资料

时光流逝,岁月难留,抢救史料,刻不容缓。新疆政协文史资料开辟“口述新疆”专题,面对从工作岗位上退下米的各族各界人士,作为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和见证人,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留传后世。

政协文史资料区别于国史、党史、地方志、档案资料和文献资料,是当代人写当代事,当代人证明当代事。当事人写当时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具体、翔实、生动地记录中国历史进程,具有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的独特作用,是一项具有统一战线特色的文化工作,是各族各界代表人士记述的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

一段历史时期、一个历史方面、一个历史事件、一个政权系统、一个派系及其人物……都是政协文史资料的征集内容;按题找人、因人出题、自拟题目……都是政协文史资料的征集途径。广征博采,真实鲜活,不求史料的系统全面,不拘观点,不限体裁,坦诚直言,秉笔直书,如实反映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点点滴滴。

公开出版“口述新疆”文史资料专题,是有组织、有主题进行征集,有计划、按规定进行出版。精选精编,成册成书。

历史的存在是基于人类的记忆,“口述新疆”的作用就是保存人们生活中有血有肉的新疆故事,就是让人们与前人一起感受同喜同悲的新疆故事。让“口述新疆”记录过去、服务当代、面向未来,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延伸。

自序

献给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

这本书从策划访谈到调研实施及后期整理直至最终出版,细算起来有近5年的光景。这些年,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这里的所有人,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书中所追述的历史记忆与我们试图追述的行为本身都一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无可争议地融入新疆现代文化史的长河激流之中,留待后人评说。

本书是一次新疆本土化的女性口述史的有益尝试,在历时4年多的口述访谈材料的基础上,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审视了新疆当代文化的历史变迁过程,并展示了两代人关于职业女性生命话题的对话和思考。全书由20余万字和40多幅照片组成,图文并茂,以口述的方式记录了23位汉、回、满、维吾尔、哈萨克、锡伯、乌孜别克等多民族女干部的成长故事。她们的职业多样,有教师、作家、摄影师、医务工作者、农业技术人员和党政机关干部等。她们于20世纪50年代左右投身于新疆的社会主义建设行列,她们对新疆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一座用挚爱凝成的丰碑,会永远矗立在新疆儿女的心中。她们的故事或传奇跌宕或平淡从容,既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又充满鲜活的个性色彩。本书重点展示了这一特殊的群体如何在物质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创造了生命辉煌的心路历程,以及她们在女儿、妻子、母亲、工作者等多重身份下,在家庭与事业之间如何展示真实的女性的生命体验。无疑,这种叙述在现有的历史书写中尚未得到充分尊重。

1951年4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作《关于加强妇女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重视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有计划地培养各民族妇女干部。一大批妇女干部顺应这一强劲的政治形势,紧跟时代潮流,听从党的安排,投入到新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行列,为新疆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历史性

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她们的生命历程见证了新疆当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本书所访谈的诸位,便是这支队伍中优秀而平凡的代表和典范。

我们访谈面对的是七八旬的长者,其中有的人健康状况已不适合访谈,还有的在我们拟采访之初得知人已离去……随之而去的便是那个时代丰富而珍贵的记忆,渐行渐远消失在历史的背影中……它使我们有种时不我待的迫切感和挽救文化遗产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愈来愈强烈地震荡在我们心中,催促我们克服经费、时间、精力等所有方面的障碍而积极推进。在访谈过程中,聆听前辈们或激昂或平实的述说,我们一次次被她们的生命故事所感动,并不断修改着我们关于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记忆,校正我们关于时代、性别、年龄、生命、职业、教育、家庭、婚姻等诸多话题的偏见和定论,同时也愈加深刻地体验口述史的魅力。这些过往的尘封往事因当事人的在场叙述和我们作为听者的倾听与追问,细致、鲜活地展开其历史繁复、真实的褶皱。

书中收录的这23位女性,只是因缘际会于偶然中收获的新疆历史、文化、女性风景的一角。记录的方式在今天这个影像充斥的年代,略显呆板和笨拙,却是集体努力的心血所在。坚守精神文化的传统,坚信文字叙述的魅力,是这个小集体的立场所在。这些文字,这个过程,这种坚守,成为我们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印记。

以此为序。

编者
2010年冬

目 录

往事宛如昨

——穆廉自述 / 001

我的母亲西谋珍

——访原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副州长、自治区政协常委
西谋珍之女玛德丽娃 / 023

从西部战场到新疆屯垦戍边

——张秀云自述 / 035

执著于新疆妇女解放事业的人

——玛依努尔·哈斯木自述 / 047

火一样的干部

——访原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协副主席波波汉 / 069

在希望的田野上播撒人生

——访原自治区妇联副主席宋愚哲 / 079

工作改变了我的命运

——访原新疆广播电视厅机关党委副书记
艾木拉罕·玉素甫 / 089

党派我到边疆为少数民族服务

——访原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友谊医院眼科专家丛美芝 / 101

朴实而崇高的愿望

——访原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政府第一招待所
支部书记茶汗 / 119

迎接新生命的岁月

——访原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医院副院长王才仁 / 125

维吾尔语言的探索道路

——访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维吾尔语言学家
阿米娜·阿帕尔 / 131

共产党是我的领路人

——访原昌吉回族自治州妇联副主席刘韵珂 / 139

我的命运我做主

——访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女工部副部长魏玉英 / 151

一个快乐的工作者

——访原自治区妇联干部海尔尼莎·阿不都拉阿吉 / 165

在党的关怀下成长

——访维吾尔族第一代女摄影家塔吉古丽 / 173

文检生涯五十年

——访原自治区公安厅高级工程师汪文秀 / 179

丝绸之路上的舞者

——访原新疆军区文工团国家一级编导孙玲 / 191

思想·魄力·智慧

——访原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妇联副主席金素英 / 209

直爽泼辣的乡村女教师

——访原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县某镇小学校长
佟文兰 / 219

芭蕾舞艺术在新疆的传承者

——访原新疆艺术学院芭蕾舞艺术家莎丽曼·吾拉孜
之女库来惜·阿不都拉 / 225

四十三个春秋的默默奉献

——访原自治区公安厅法制处正处级侦察员
阿米娜·库尔班 / 231

影像中的人生

——访原自治区歌舞剧院摄影师哈斯娅提·毛拉吉瓦 / 237

无悔的岁月

——访原塔城地区乌苏县解放路派出所指导员张秀英 / 249

后记 / 259

往事宛如昨

——穆廉自述

穆廉简介

穆廉,女,汉族,中共党员,1922年2月5日生于河南省确山县。

1933年7月—1936年7月,在河南信阳第二女师初师部学习并毕业。

1937年10月,在范文澜主办的河南大学抗战训练班学习。

1937年12月,参加中共河南省委领导的开封部分爱国青年学生组织的抗日救亡团体——光明话剧团。

1938年9月,赴延安抗大学习。

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7月—1941年12月,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劳动。

1942年1月—1945年12月,曾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文工团、西北五省联防司令部政治处、延安和平医院、贺龙子弟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纵队任教导员工作。

1946年1月,在三五九旅部队从事教育工作。

1947年2月,在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二军文工团二队、南疆军区政治部工作。

1952年2月,从部队转业,先后任中共喀什市委宣传部部长、副书记。

1956年7月,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区级机关党委工作。

1976年9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政治处任宣传部部长、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1986年正式离休。

童年忆事

1922年2月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我出生在河南省确山县城里。

确山是个小县,在我们小城镇里,我父亲姓杨,当时杨家算得上是个书香

门第的大户人家。祖上在明清时代也是朝服加身,顶戴花翎,显赫一时。到了父亲这一辈,虽已家道中落,但还留有近百亩土地,靠这份家产,生活过得还算富裕。父亲秉承祖训,念私塾,上黉学,熟读诗书,乐善好施,热心公益,并刻苦自学成了当地有名的中医,颇得地方好评,是著名士绅。在中华民族危难时刻,他为民族为人民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县人民代表。与父亲门当户对的母亲是西山胡寨有钱人家的姑娘,颇通文墨,是典型封建家庭的贤妻良母。我有两个哥哥,我的降临给这个家庭带来了许多欢乐,我的幼年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

我5岁那年,母亲让我上私塾读书。我在私塾先后学习了《三字经》、《弟子规》、《论语》、《孟子》、《诗经》等。一直上到8岁那年,见到有一女孩去上女小,我就央求母亲也让我上女小,但遭到母亲拒绝。又过了两年,我10岁了,得知三舅妈李凤池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被聘为县女子小学校长,我又向母亲提出去上女小的事,仍遭拒绝。我就跑去找三舅妈,请她替我说情。舅妈跑了好几趟才说服了母亲。从此,我就插班到女小四年级读书。由于我念过几年私塾,在班上语文成绩比较好,老师经常让我做示范、读课文、解释生字,也经常表扬我。12岁时,我小学毕业,父亲给我起了“杨淑婉”这个学名。

我以优异的成绩小学毕业后,学校刘桂兰老师担心我辍学太可惜,就派了一位同学约我到外面同她见面,刘老师说:“马上回去准备几本应用的书、笔墨和换洗的衣服,今晚10点前到车站集合,我们等你。”我听了之后,既兴奋又害怕,担心被家里发现,最后还是下定决心,悄悄做好了准备,乘母亲不注意时,提着我的小藤篮直奔火车站。刘老师带着我们到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当我把报考信阳第二女师被录取的情况告诉母亲后,她和全家人都很高兴。在信阳第二女子师范,我开始了人生中青年时代的历程。

青春似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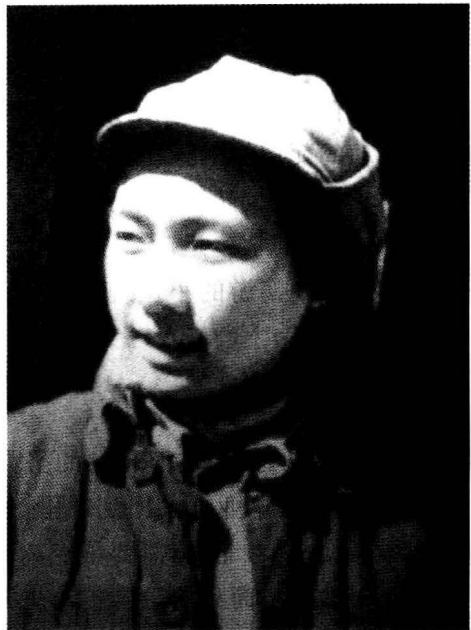
我在信阳第二女师上了三年初级师范,学了很多东西。三年中我懂得了许多过去根本不知道的事情。我读初师三年级的第一学期末,即1935年底,就同班上同学一起跟上高师的同学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我并不大了解这次运动的真正意义,主要是我二哥和一些开封的大中专同学来到信阳发动学生运动,我也就去火车站参加了卧轨行动,跟大家一起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

我在这次短暂的活动中，大开眼界。学生们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亢的革命气势吓得那些官僚、地主都躲了起来。火车也停驶了，车站轨道上停了数不清的车皮。我第一次感到不拿枪的人威力也会这么大，那些群众害怕的“丘八”大爷们的威风扫地了。

信阳在平汉线上，距武汉三镇很近，交通方便，信息灵通，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也大。当时反对封建主义、打倒军阀、提倡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反对重男轻女等思潮，在我们学校宣传得沸沸扬扬，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也激起了一阵阵波澜。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我深深地认识到我在家中就是处于男女不平等的地位。父母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使我不敢轻易反抗。他们让我上四五年私塾，仅仅是为了让我“知书达理”，遵循古训，做一个“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没有自己人格、尊严和地位的女人。他们何曾想过当时已是民国二十多年的革命时代了！对于他们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我并不怪罪他们。因为怪也没有用，那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了，我应该考虑的是今后自己应该怎么办。

在小学和信阳师范上学期间，我看了不少古典小说，非常佩服穆桂英戎装挂帅大战沙场、花木兰替父从军为国杀敌的巾帼英雄气概。这些英雄形象都是封建时代的妇女，最终仍免不了“三从四德”的命运。后来看了秋瑾的故事，我觉得自己找到了学习的榜样，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像秋瑾那样轰轰烈烈地干一场。然而要干一番事业，就非得自己有本事不可，首先必须学好科学文化知识。

在信阳师范上学的时候，每星期一上午第一节课，全校师生都要到大礼堂集中开总理纪念周大会。会上，高声朗诵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训，背诵总理遗嘱：“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声音响彻大厅。当时我对“革命”二字十分生疏，但这个名词却是很时髦的，也牵动着许多进步青年的心。我



20 世纪 50 年代的穆廉

的思想里朦胧地意识到参加革命是光荣的事,也是要担风险的事。我忽然对在学校被捕的同学和革命志士们产生了同情和崇敬的心情。这种想法,却从来没敢对任何人说过。由于封建家庭和社会习俗的禁锢,我只是个呆板的、不爱活动的死读书的人。到了信阳女师之后,才得以参加不少歌舞活动和体育运动,并成为校队队员,有时还到校外参加比赛。参加校外组织的同乡会以及“一二·九”学生运动……三年中我欢乐得像一只在蓝天飞翔的燕子,像一条跃入水中畅游的小鱼,蓝天白云、激流浪花都为我所拥有了。

追求光明

1936年6月,我按照自己的努力方向,顺利地完成了信阳第二女师初师部的学业,带着毕业证书回到家里。就在这年的7月5日前后,二哥告诉父母亲,他要到北京考北大,需要早点离家报考。二老当然十分高兴,立即为他筹措路费和学费。而我向母亲提出去开封继续升学的要求却遭到家中的阻拦。母亲不止一次地说:“女孩子嘛,再有多大本事,将来到了人家(指婆家)家里,有什么用呀!”一听到这里,我马上想,看来这个家不想要我了,眼泪不由得一下子像泉水般涌了出来。我捂着脸跑回自己小房子里,蒙头大哭起来……后来二哥向父母说情,经过二哥的周旋,我总算比较顺利地离开了家,考上了省立女师。

1937年上半年,我的各门功课都达到80分以上,特别是英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学习的信心一下子高涨起来。7月的一天清晨,我同室的几个同学刚走出房门,就听见墙外嘈杂的人声和喊叫“号外”的报童急促的奔跑声。不一会儿,一张“号外”就从墙洞口递了进来。我们马上围拢着争相观看,那几个大标题就像支支利箭射进我们眼里:“日军炮轰卢沟桥,进占宛平!”不知谁喊了一声“日本鬼子又侵略我们华北了,要当亡国奴了,我们什么时候能打回老家去呢!”哇的一声,她哭了起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东北籍的流亡学生“小机灵”。接着,大家议论纷纷,有的慷慨激昂,誓雪国耻;有的痛哭流涕,义愤填膺……

高年级同学白天很少留在校内,有的到校外参加宣传活动,有的参加各界组织的座谈会、声讨会、请愿会。回来后,她们激愤的情绪和高唱着的激情洋溢的救亡歌曲,使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夜晚难以入睡。之后,我也跟她们学了几首歌曲。直至两年后在延安的一次学习讨论中,我才知道她们当时还参加了开封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的活动。

9月间,开学了。语文、历史、地理等课都成了形势报告会、时事报告会和教唱救亡歌曲的课堂。语文老师冯素陶对形势的分析和关于青年前途的讲座讲得特别好。他详细讲解了日本帝国主义炮轰卢沟桥、占领宛平的情况。冯老师侃侃而谈,慷慨激昂;同学们听得义愤填膺,跃跃欲试。

广大学生不断受到老师关于形势教育和国内进步人士邹韬奋等创办的报刊宣传的影响,对于当前国家危难有所认识。大敌当前,大家深深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怎能不闻不问,坐

以待毙!但学校当局仍不准学生出校门。后来女师同学队伍从校内冲上来,才得以打开铁门,闯出来参加游行。目睹这一壮举,我和许多同学都激动地流下眼泪,深深感到群众力量不可侮。我一定要和广大爱国青年一起参加救亡活动,这样才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我积极参加了学校的抗日戏剧演出,高唱革命歌曲,还和许多同学一起参加了农村服务活动。每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我们都到开封市郊向农民宣传打倒日本侵略者、救中国、不当亡国奴的道理,有时还教农村小学生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歌》等革命歌曲。为了学到抗战本领,我和北仓女中大部分同学经过考试,参加了河南大学著名教授范文澜、肖一山、稽文甫等组建的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

这个训练班的学生很多,包括开封市各大专院校、中学的部分学生,记得河南大学的一栋宿舍楼都住满了。对面宿舍楼住的是国民党组织的开封市大专院校军事训练队的学生。我们每天到食堂吃饭,从他们楼下走过,都要遭到他们泼水、倒垃圾、倒剩饭和谩骂之类的骚扰,这使我们更加加深了对国民党反动派驱使学生行为的反感。我觉得这一群人就是反对抗日救亡活动那些人的代表,抵触情绪很大。后来抗敌训练班的领导告诉大家,由于形势紧张,我们的学习时间只有三个月。为了保证这短暂的学习时间,要求大家千万不要



抗战时期穆廉参加光明剧社

受外界干扰。从这以后,我们也就有意地躲开“军训队”的干扰。

抗敌训练班的学习形式很特别,不论文化水平高低,一律集中在一起上大课;只要是好天气,大家就盘膝坐在露天里上课,上完课就分组讨论。课程有中国革命运动史、大众哲学、统一战线、游击战术和当前形势。开课不到一个月,由于开封市经常遭受敌机轰炸,我们就跑到距河南大学不远的铁塔公园去上课。有时敌机一天空袭几次,我们就翻过城墙,伏在城墙外的沙滩上听课。听课的越来越少,听说大部分人参加范文澜教授领导的河南省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了,有的回家了,有的到山西前线去了。我跟高三班的李秀媛参加了河南省文化动员工作团——光明话剧团,准备到豫东各县进行巡回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投身抗日洪流

1937年12月,我参加了中共河南省委领导的、由开封部分爱国青年学生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团体——光明话剧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揭开了日本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序幕,北平、天津、保定相继沦陷,河南危在旦夕。当时河南省省会开封的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接着,开封市的各大中学校以抗日救国为内容的街头剧、活报剧、小话剧等剧种,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光明话剧团的前身,就是1936年由开封一些学校的男女学生较先组织起来的抗日救亡团体,在城市街头和农村多次上演过抗日救亡内容的剧目。

我和李秀媛到光明话剧团报名后,才发现北仓女中的教师林亮(原名林英亮)已先于我们被邀请参加了剧团,并被选为团长。影影绰绰地记得,这一天剧团举行了第一次集会,是在一间缺少阳光的昏暗的小房子里,团长林亮给大家讲清了剧团的任务和困难。剧团是个文化团体,是个学生组织,要向广大农民宣传组织起来抗日救国,保卫家乡,强调这工作非常光荣,也非常艰巨,号召大家一定要自愿参加,做好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树立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坚定信念。我听了这些话,心情非常激动,觉得在祖国危难之际,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国家、报效国家是义不容辞的事。大家争先恐后地表示自愿参加,此时此刻,共同的信念让原来互不相识的一群青年人很快就结成了一个集体。

抗战初期,在广大农村地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是非常困难的。记得剧团在开赴豫东时,没有一分钱经费,购置一些最简陋的布景、道具、化妆品

的费用,也是大家捧着募捐册像求乞似的求亲友“施舍”的。伙食钱是由最初的参加者每人预交五块钱凑的。我们顶着严寒酷暑、风霜雨雪,踏遍豫东、豫南大部分城镇农村,凭的是两只磨不穿脚底板和因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所迸发的坚强意志。我们离开开封,近一年的流动演出宣传,大都是徒步行进,有时能找上一辆大马车,拉着布景、道具和演员简单的行囊,就是最好的条件了。有的时候只好把布景分开,连同道具、行囊等分配给每一个同志背着走。吃饭是有什么就吃什么,没有就饿着。当饥饿难忍或乏累不堪的时候,我们就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唱,精神就来了,就忘了饥饿乏累。

我们的剧团,演出了不下二十多出抗日救亡题材的戏,大部分是从上海演剧队及其他地方引进的剧本,如《九一八以来》、《张家店》、《顺民》、《放下你的鞭子》等,也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编写的,如《周年祭》、《不能走那条路》、《敢死队》、《林中口哨》等。每个兄弟姊妹都或多或少担任着几个不同角色。其实,我们大家都没有经过戏剧表演艺术的专业训练,也没有丰富的舞台经验,只有少数人是学校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在每年节假日演过几次校园话剧,多数人还没上过舞台。虽然我属于前者,但毕竟不是专业戏剧工作者,只是凭着抗日救亡的一腔热血闯入戏剧艺术殿堂的。那时,在舞台上只知为苦难的祖国和同胞遭受日寇铁蹄践踏而情不自禁地流淌着热泪,为宣泄对日本鬼子和汉奸走狗的无比仇恨,呼唤人们同仇敌忾奋起斗争,为鞭挞侵略者灭绝人寰的暴行而痛揭其禽兽嘴脸!每个演员都好像和所扮演的角色很自然地融为一体。虽然当时我们还不懂得什么表演方法和“进入角色”之类的名词,但都能以朴实真诚的表演,迅速和广大观众的思想感情产生共鸣,点燃他们内心深处的抗日火焰。那些震撼人心的场景,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惊心动魄的呼喊,即使是过去几十年,但每忆及此,仍然令人激动不已。

在豫东各县,除了在农村通过演出、宣传和广大农民接触以外,在城市每到一地,为了开展统战工作,我们都要召开当地上层民主人士、士绅、有名望的学校校长、教员以及各阶层妇女座谈会,宣传光明话剧团的任务,讲解当时日寇进攻形势和全国各地抗战的情况,希望他们支援抗日救国战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起来,共赴国难。宣传地不分南北,宣传对象不分老幼,号召大家为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收复祖国大好河山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座谈会上,林亮团长每次都讲得激昂慷慨、义正词严,控诉日本鬼子奸淫掳掠、践踏中国土地和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痛斥汉奸走狗为虎作伥、帮助鬼子做事的丑恶嘴脸。参加座谈会的人,有的立即签名,表明支援抗战的态度;有的还拿出捐款,

表示爱国抗战的决心。不少知识青年和教员表示要在城内办墙报、作宣传,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在蓟东县的演出宣传活动中,也的确遇到过个别有见识、有爱国思想的政府官员,他们囿于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挟制,即使反对妥协投降路线,赞成抗日救亡活动,也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真正思想。但是观看我们多次的演出和宣传后,也设法在一定的场合,表达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立场态度。西华县县长楚博,是党的统战工作对象,受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影响,热心支持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反对日寇侵略的行动。我们离开西华时,他除赠送大洋一百元外,还动员当地人给剧团每个演员制作一套紫花棉布制服。后来楚博县长被国民党反动派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

1937年12月29日早晨,我们整队离开河南省省会开封,踏上宣传抗日救国征途的第一站——陈留县,大家兴奋地书写标语、张贴漫画、办起墙报,忙得不亦乐乎。不料夜里就有人前来捣乱,说我们不应该张贴“实行民主政治”的标语,又说我们是非法组织,要进行搜查。经我们义正词严地反驳,同时拿出省里的介绍信后,那一伙无赖才溜之大吉。

剧团的活动在豫东、豫南各县逐步扩大了影响,那些反动分子更加不甘心了,针对群众的热烈称赞,他们竟然对我们造谣中伤。有时在演出中有人装疯卖傻,用无耻的手段给女演员写“你是我的知心女友”的纸条,让人忍无可忍。林亮除了当场指责送条的人外,又拿着这个条子去找有关人讲理。河南省第七行政督察专员,思想进步,很支持各县的抗日救亡工作,也给光明话剧团的工作不少帮助。对那种卑劣做法,他们曾给予严厉的训斥。目睹这一幕幕丑剧和反动官员们可恶的嘴脸,我对国民党反动当局和他们豢养的走狗,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我在思想上、政治上都进一步成熟起来。

每当回忆起那段战斗的峥嵘岁月里所度过的传奇般的演出生活,那些教育、哺育我投身革命洪流,坚定了中国会不亡的信念的父老乡亲,特别是曾在西华相聚直接领导我们工作,而在不久之后与日寇浴血奋战中壮烈牺牲的中共豫东工委和西华县农民武装的领导同志们,心中都无比地怀念和崇敬。我永远不会忘记已先后离开人世的曾和我一道跋山涉水、忍饥受饿、进行艰苦的抗日救亡活动的兄弟姐妹,也永生不会忘记我是在光明话剧团的怀抱里开始起步,走上抗日宣传道路,投身于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的。

奔赴延安

我能走上革命道路,除了我所置身的革命环境中那些可敬的长辈对我的教育影响外,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我的二哥,可以说,二哥是我奔赴延安的引路人。二哥在省立高中非常活跃,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一二·九”运动时,他就是学运的中坚分子,又是撰写革命传单的笔杆子。他和高中的一些同学到豫南名城信阳,引燃“一二·九”学运的风潮。从那时起,我就在幼小的心灵里树起了二哥无限风华的标识。

1936年,他考上北京大学后,我就很少和他见面了。直到1938年夏季,我在河南省文化动员工作团——光明话剧团工作,因脚气病发作回老家治疗时,才遇到也在家乡工作的二哥。从此二哥不断向我讲述国际形势、家乡的革命斗争、解放区形势、抗战游击战争、红军长征、革命青年奔赴延安等方面的情况。有一次,二哥很严肃地告诉我,现在去延安的内地青年学生很多,他也想去,只是目前他的工作还离不开。说着他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表,让我填写。在介绍人栏里,二哥让我填上余潜的名字,说他是确山县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是他的好朋友。1938年秋我到达延安,进入抗大,立即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和军事训练之中,对二哥的惦念与日俱增。后来我才得知,二哥做了大量的党的地下工作,后被叛徒告密,被国民党汤恩伯部以“通匪”罪名抓进集中营。在狱中他经受了严刑拷打,矢志不移。1944年秋天,二哥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精神失常,保外就医。听说去延安的学生,有人写信回家,被反动当局查出来,家人都受了牵累,有的还坐了牢。为了掩人耳目,二哥把“杨”字拆成“木易”,一直无人知晓。由此我也决定改姓“木”,又按谐音改成“穆”,又考虑到秉承古训,取“清正廉明”、“廉以奉公”的“廉”字,合起来就是“穆廉”,即肃穆廉洁之意。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我和广大革命青年一样,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受到各级领导和老师的厚爱。我在延安学习、工作了八年,得到了锻炼、提高,懂得了如何学习,如何做人,如何革命,如何为崇高的理想坚贞不渝,如何为解放全中国和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奋斗终生。1938年3月,我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是在战争和艰苦环境中于1939年7月20日诞生的。当时延安在日、伪、蒋三重包围中,近千名由全国集聚来的革命女青年先后进入学校,大家都十分珍惜在这里的学习机会和所获得的理论知识、革命斗争艺术与实践经验。女大的这段生活,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上大课